

农户行为理论分析框架下宅基地流转

主体特征与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黄建伟 张兆亮¹

【摘要】通过实地调研数据分析探讨宅基地流转主体的行为规律和影响因素对推动农村闲置宅基地高效、可持续流转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农户行为理论构建农户特征、宅基地特征、地权稳定性等 8 个特征因素的 21 个变量，借助 4 省的 1053 份问卷调查数据，利用类比分析法和 Logistic 模型对宅基地流转的农户群体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宅基地流转与未流转的两类群体样本中有 20 个变量都存在明显的分布差异，反映出流转农户特有的群体特征；在影响因素分析中，农户的年龄、性别、是否购买养老保险、是否具有手艺或颁发使用权证等 14 个变量对农户宅基地流转行为具有不同强度及方向的显著影响，且影响因素随着宅基地距市（县、区）中心距离的远近不同而存在差异，总体呈现为与远郊农村相比，近郊农村宅基地流转的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多样。研究认为，在未来的宅基地流转工作中，地方政府可依据宅基地流转的主体特征进行流转群体定位，并根据不同特征的宅基地及农户给予不同的工作重心关注。

【关键词】宅基地流转 农户行为理论 影响因素 群体特征 Logistic 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70(2022)-01-0039(13)

一、文献回顾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规模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导致农村宅基地闲置的问题日益突出，空心村现象也越发明显，附加农村固有的一户多宅、村庄分布零散等历史遗留问题的存在，不仅造成了我国土地资源的闲置浪费，更对乡村治理、社会稳定、村容村貌等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弱化了乡村的自身发展能力。^[1]为此，如何促进农村闲置资源的盘活利用、提高宅基地的利用效率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研究问题。自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政策已实施三年有余，在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很多地区都为推进农村闲置宅基地流转积累了大量经验，学术界也从不同维度的研究中为助推闲置宅基地的流转献计献策。

关于宅基地流转的相关研究，学者们的研究视角主要包括：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法理分析，政府职能和规制在流转过程中角色扮演与定位，宅基地流转的问题、模式和实现路径，不同特征宅基地流转的影响因素以及流转前后农户福利的变化。关于流转的法理分析，研究者们认为应赋予农民充分的自主决策权，并在立法技术上实现农民个人、集体及社会主体间的三权兼顾配置格局。^[2]关于政府职能与规制，研究显示，在明确政府参与性重要作用的同时，政府职能也应从刚性管控向以自愿、有偿条件下的协同治理新路径转变。^[3]关于流转的问题、模式和实现路径，研究发现，流转制度存在法律供给不足和滞后的问题，流转过程中应强调农民主体的市场竞争性原则，从集体主导和农户自决的双重路径展开，培育多种形式的服务平台，发挥中介机构作用，构建以市场为主体的合作共赢新格局。^[4-5]关于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者们主要以农户的流转意愿为因变量，运用 Probit、Logistic、DID 等方法分析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强度和影响方向，其中主要涉及农户特征、宅基地特征、确权等因素对农户宅基地流转

¹作者简介：黄建伟 教授 南京财经大学政府管理研究中心 江苏南京 210023

张兆亮 硕士研究生 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乡村共享经济新业态背景下闲置宅基地流转的政府权能研究”（编号：19BZZ08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意愿的影响。^[6-7]此外,还有很多研究者对宅基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异质性进行分析,分别探讨不同类型特征下宅基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异同。^[8]关于流转前后农户福利的变化,有学者以农户福利变化为因变量,对农户福利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9]也有学者以农户为研究对象,探讨宅基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的福利变化差异。^[10]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与总结,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与以往研究不同,考虑到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与是否能够成功流转之间还存在差异。因此,本文以农户家庭宅基地是否流转为因变量,通过对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4省的调查与分析,^①从农户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生活保障水平;宅基地的地权稳定性;宅基地和农房状况、宅基地自然禀赋和社会禀赋以及地方政府的政务服务8个方面构建宅基地流转的影响因素框架,定量测度各因素对宅基地流转的影响方向与影响强度,并利用宅基地有无流转的两类样本进行群体特征类比分析,探寻不同决策群体的特征差异,以期探索优化宅基地流转模式、助推闲置宅基地合理高效流转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二、理论分析:基于农户行为理论的分析框架

1. 农户行为理论及其分析

宅基地流转属于农户的一项行为选择。关于农户行为理论的研究,学术界主要分为三大流派:即实体经济学派、形式经济学派和历史学派,^[11]而其又与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具有一一对应关系。其中,实体经济学派对应风险最小化,该学派认为小农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小农是典型的风险规避者,他们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家庭需求,追求的是生产、生活风险的最小化;形式经济学派对应完全理性,该学派认为农户是理性的个人,他们会基于现有资源,根据自身的需求或偏好进行合理的决策,以期达到帕累托最优,实现利益的最大化;^[12]历史学派对应于有限理性,该学派认为农户是基于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之间进行决策,即他们会受内部环境因素、外部环境等其他不确定因素的制约而难以做出完全理性的决策行为。

从当今我国农民的实际情况看,农户在进行宅基地流转决策时更满足于历史学派观点,即有限理性人假设。在决定是否进行宅基地流转时,农户既会考虑宅基地流转给自己带来的经济收益,也会考虑宅基地流转后给自身及家庭未来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程度,而受此方面影响的宅基地流转决策行为往往会反映在农户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等其他内部环境因素的制约上。在此过程中,农户又会因为宅基地使用权证的获取、宅基地禀赋条件以及其他外部环境的综合影响而做出不同的决策,往往最终的决策结果又能进行很好的群体划分,反映不同决策结果下行为主体的特征差异。由此可见,在对农户宅基地流转的影响因素问题研究上,基于农户行为理论,综合考虑可能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的内外外部因素,并依据相关特征进行宅基地流转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对推动农村宅基地流转具有重要意义。

2. 影响宅基地流转过程的机理分析

若想更深入地把握宅基地流转盘活的实现机理,我们至少应该从“政策的内在机制、宅基地自身条件和农户的行为选择”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其一,对于制度机制,宅基地流转是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政策目标,与宅基地退出不同,宅基地流转针对主体为未放弃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农户,即在保留农户对宅基地资格权的基础上将农户的闲置宅基地及农房向外流转,增加农户的财产性收入。^[13]流转过程中,宅基地的用益物权并未消灭,只是将宅基地资格权主体与使用权主体进行限期分离,此时宅基地的真实使用权人并非宅基地资格权人,待流转期满后,宅基地资格权人有权对流转的宅基地使用权进行收回,重新实现宅基地使用权主体与资格权主体二者的重叠。因此,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农户理解政策的内在机制并将其与农户的现实需求相对接,从而增加农户对政策的信任度,促使宅基地流转工作变得更加顺畅。此外,宅基地流转也需适时、适度的政府力量参与,为流转的实现提供条件和保障。其二,对于宅基地自身条件,宅基地流转的实现方式一般包括转让、转包、互换、出租、入股、抵押等,流转后的宅基地用途一般也包括其他农户居住、村集体开发、旅游公司开发等,而对于不同禀赋条件的地区,流转后的

^①江、浙、皖、赣四省位于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经济发达,新型城镇化率先进入“快车道”,农村宅基地流转制度改革先试先行,走在全国前列。

宅基地用途也不尽相同，这也便导致了不同地区宅基地流转的操作性和收益性存在差异，如对于一些禀赋条件好的地区宅基地，会有大量的社会资本和外界需求参与，推动宅基地流转的市场化运营，而对于一些禀赋条件较差的地区，村庄农户逐年减少，而又受禀赋条件的制约使得宅基地流转一直存在被动局面。因此，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根据本地区不同区位的宅基地禀赋条件选择恰当的流转运作模式，推动宅基地流转政策的高效实施。其三，农户的行为选择，农户的行为选择是影响宅基地流转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最为复杂的因素，农户不仅会权衡宅基地流转的利弊而做出理性人决策，也会受自身及周围环境的影响而做出感性选择，已有研究大量表明，农户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制度实施方式等都会影响农户流转宅基地的决策行为，^[14]中间虽会因为不同的研究者选取不同的研究方法或研究数据导致相关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强度存在差异，但主体方向未发生改变，即农户进行宅基地流转的收益要明显大于其留作他用的机会成本，且不会因为宅基地流转而增加家庭未来的生活风险。

三、数据描述与研究方法

1.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成员在实地的调查问卷，时间跨度为2020年7月至2021年3月。问卷调研所涉地区包含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和江西省4省。问卷先采取“立意抽样”后再采用2:1“等距离抽样”，共获取有效问卷1053份，问卷分布如下：江苏省214份、浙江省385份、安徽省254份、江西省200份。

从所获得的样本数据看，在1053份有效问卷中发生宅基地流转的问卷量为271份，占样本总数的25.74%。被调查对象的年龄大多在26~55岁之间，占比为83.86%；男性占比55.08%；文化程度以初、高中与中专为主，占比60.02%，其文化程度偏高的原因可能与调查方式、调查时间以及被调查对象的年龄有关，受疫情影响，此次调查采取纸质问卷和电子问卷相结合的形式，且大部分数据来源于节假日期间，此外在被调查者中年龄在40岁以下的占比43.78%，这部分群体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身份以普通农民为主，占比69.90%；人们的养老保险参保比较普遍，占比为76.16%，而具有一技之长会手工艺的人却很少，占比仅为23.19%。被调查对象的家庭人口数量主要在3~5人之间，占比74.35%，其中，务工人数为0人的家庭占比40.42%，为1人的占比22.24%，为2人的占比25.22%，可以看出被调查家庭的外出务工人口较少；家庭年均收入分布较为均匀，5万以下的占比为26.50%，5万（含）~10万（不含）占比为43.25%，10万（含）~15万（不含）占比为17.14%，且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来源多以外出务工为主。

此外，从宅基地使用权证发放情况来看，已发放量占总样本的63.82%，因此各地还需加快对宅基地的确权颁证。从宅基地、农房的基本状况来看，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四省份的农房多以砖混和钢混为主，占比为81.38%；农房层数多以1~2层为主，占比65.60%；农房的居住年数也多在30年以内，占比83.26%；宅基地面积多在200平方以内，占比88.52%。从宅基地自然禀赋条件来看，被调查宅基地周边有林地、水源的占比72.46%；有自然保护区或景区的占比38.18%。从宅基地社会禀赋条件来看，样本中宅基地距市（县、区）中心距离的分布比较均匀，能够很好的反映不同区位条件下农户宅基地流转行为；宅基地周边有交通站点、广场等基础配套设施的占比分别为43.21%和47.48%。从被调查者的政务服务满意度评价来看，达到较满意及非常满意的人数占比62.77%，表明在宅基地流转盘活过程中，地方政府工作积极，政策执行有力。

2. 研究方法

由于农户宅基地流转行为结果属于随机离散变量，有实行流转和不实行流转两种选择，因此可建立两分类别因变量估计模型加以分析，其中Logistic模型是研究该领域的理想模型。设被解释变量 y 为农户家庭宅基地是否流转，取值为0—1分布， $y=1$ 表示进行流转， $y=0$ 表示未进行流转； X 为自变量矩阵，包含各种可观测的影响农户做出宅基地流转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

具体模型原理为：假设 $f(x) = \beta_0 + \beta_1 x_1 + \varepsilon_i$ 为农户选择宅基地流转的变量线性函数，其临界值为0，

$$\begin{aligned} & \text{当 } f(x) > 0 \text{ 时, } y=1; \text{ 当 } f(x) \leq 0 \text{ 时, } y=0. \text{ 则} \\ & P(f(x)=1|x_i) = P(\alpha + \beta x_i + \epsilon_i > 0) = P \\ & (\epsilon_i > -(\alpha + \beta x_i)) \end{aligned}$$

假定因变量 y 为对称分布, 于是有:

$$P(f(x)=1|x_i) = P(\epsilon_i \leq \alpha + \beta x_i)$$

假定残值的累积分布函数为 F , 残值分布为标准 Logistic 分布, 于是有:

$$\begin{aligned} & P(f(x)=1|x_i) = F(\epsilon_i = \alpha + \beta x_i) = 1 / [1 + \\ & e^{-(\alpha + \beta x_i)}] \\ & \text{将 } P_i = 1 / [1 + e^{-(\alpha + \beta x_i)}], \text{ 进一步转换可得:} \\ & \ln [P_i / (1 - P_i)] = \ln (\text{odds}_i) = \text{logit} (P_i) = \\ & \beta_0 + \beta_1 x_i + \epsilon_i \end{aligned}$$

式中: odds 表示发生流转的概率是不发生概率的几倍或发生流转与不发生的概率比; 回归系数矩阵为待估计参数, 反映了本研究最为关注的各自变量对因变量是否进行宅基地流转的影响力大小; ϵ_i 是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

3. 变量选取

虽然宅基地退出与流转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但其都是显化农村闲置宅基地经济价值的手段。因此, 在对宅基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也可借鉴宅基地退出的相关研究成果。参考已有文献, 农户在对宅基地进行处置时会受到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宅基地特征等多因素的共同影响。^[15-16] 基于此, 本研究结合宅基地流转盘活现状以及当前农户关注的实际焦点, 从农户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生活保障水平; 宅基地的地权稳定性; 宅基地和农房状况、宅基地自然禀赋和社会禀赋以及地方政府的政务服务 8 个方面选取相关变量测度农户在进行宅基地流转决策行为时的影响因素。其主要变量的名称、定义、统计描述以及与因变量的预测方向如表 1 所示。

(1) 选取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身份四个变量代表农户特征。于农户年龄而言, 一方面, 随着农户年龄的增大, 外出就业机会变小, 其更可能留在农村生活, 这使得宅基地流转的可能性减少; 另一方面, 如今农村居住的大多为空巢老人, 他们可倚靠闲置宅基地流转获得额外收入, 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 这也可能助推农户的宅基地流转行为。对于农户的性别, 从已有研究看同样存在两方面的影响效应, 一方面, 女性为了给予孩子更好的教育, 更愿意举家搬往城镇生活, 从而对农村宅基地进行流转或退出;^[17] 另一方面, 相对于女性, 男性对于宅基地相关政策关注度更高, 心理上对政策实施的认同度较高, 从而更愿意对农村闲置宅基地进行流转。^[18] 于文化程度和职业身份两个变量而言, 一般情况下, 文化程度越高, 拥有一份稳定、高薪职业的机会越大, 留在农村生活的可能性越小, 由此更可能进行宅基地流转; 随着人们职业身份的转变, 相对于普通农民, 村或居委会干部的主要收入来源为非务农收入, 且为了响应农村宅基地流转盘活的号召, 他们也更有可能进行宅基地的流转。

(2) 考虑到家庭务工人数与家庭年均收入可能存在内生性, 因此选取家庭人口与家庭年均收入两个变量代表被调查者的家庭特征。一般情况下, 人口相对较多的农村家庭进入城镇生活的成本压力较大, 相比他们更愿意生活在原有的农村, 因此这类家庭进行宅基地流转的可能性较小; 而对于一些年均收入较高的家庭, 不用考虑生活成本的压力, 相比农村, 他们更愿意去基础设施较好的城镇生活, 因此进行宅基地流转的可能性更大。

(3) 选取是否购买养老保险和是否具有手工艺两个变量代表农户的长久生活保障水平。一般情况下，若农户购买了养老保险，则未来的生活水平得到了保障，对宅基地的依赖感降低，从而更可能对闲置的宅基地进行流转；对于拥有手工艺的农户而言，他们一般会外出务工或者到城镇租房创业，促使他们对农村宅基地的使用需求降低，流转的可能性更大。

(4) 选取使用权证变量代表地权稳定性指标。从已有研究看，若农户获得了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房所有权的书面证明，可加大农户对宅基地及农房“占有”的安全感，从而降低农户对宅基地向外流转的风险意识，加大流转的可能性。

(5) 选取农房建筑结构、农房屋数、居住年数、宅基地面积四个变量代表宅基地及农房状况。一般情况下，农房的建筑结构越好、层数越大，则表明农户对宅基地及农房的付出成本越高，即使随着农房屋数的增加，其闲置空间的可能性增大，但由于农村很少有与他人合住的传统，且建高层农房的农户家庭经济收入一般较高，因此也不愿意将宅基地及农房对外流转；对于农房的居住年数，居住年数越高，说明农户在农村生活状态越稳定，未来搬迁的可能性越小，宅基地闲置的可能性也就越小；而对于宅基地面积，农户拥有的宅基地面积越大，其闲置宅基地的面积可能也就越大，因此更有可能将其对外流转。

(6) 选取是否有山林或水源和保护区或景区两个变量代表宅基地的自然禀赋。不同的地形地貌特征不仅对农户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重要影响，也影响到宅基地流转的最终结果。一般情况下，宅基地所处区位的自然条件越好，未来被用作投资开发的可能性越大，这类宅基地被流转的可能性也越大。

(7) 选取宅基地距市（县、区）中心距离，宅基地周边是否有交通站点、广场、医院学校、超市购物五个变量代表宅基地的社会禀赋。以往研究表明，宅基地距市（县、区）中心越近，其经济价值越高，则更容易对外进行流转。于基础配套设施而言，对宅基地流转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影响效应，一方面，配套设施越健全，表明宅基地所处的区位条件越好，人们的生活越便利，进行宅基地流转的可能性越小；另一方面，因为基础配套设施较好，会吸引周边农村的农户聚集生活，在 market 需求的推动下，宅基地流转带来的收益也会增加，这同样会促使部分农户将宅基地对外流转。

(8) 选取被调查者对地方政府的咨询、服务满意度评价指标代表政府的政务服务。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实施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积极性越高，提供的宅基地流转渠道越顺畅，为农户带来的咨询、服务越好，农户对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相关政策就会越了解，从而提高农户对政府的政务服务满意度水平，增加农户进行宅基地流转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在拟定的 21 个变量中，有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年均收入等 17 个变量可能对农户宅基地流转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年龄、家庭人口、农房屋数等 10 个变量可能对宅基地流转产生消极的阻碍作用。

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预测方向
因变量				
家庭宅基地是否流转	0=不流转；1=流转	0.25	0.44	
1. 农户个人特征				
年龄	1=25 岁及以下；2=26~40 岁；3=41~55 岁；4=大于 55 岁	2.63	0.75	+/-
性别	0=女性；1=男性	0.55	0.50	+/-
身份	0=普通农民；1=村或居委会干部	0.30	0.46	+

文化程度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中专、高中；4=大专；5=本科及以上	2.89	1.11	+
2. 农户家庭特征				
家庭人口	1=1~3人；2=4人；3=5人；4=6人及以上	2.26	1.09	
年均收入	1=收入<5万；2=5≤收入<10；3=10≤收入<15；4=15≤收入<20；5=收入≥20万	2.22	1.08	+
3. 生活保障水平				
养老保险	0=未购买；1=购买	0.76	0.43	+
传统手工艺	0=不具有；1=具有	0.23	0.42	+
4. 地权稳定性				
使用权证	0=未颁发；1=颁发	0.64	0.48	+
5. 宅基地、农房状况				
建筑结构	1=土坯和砖木；2=砖混；3=钢混	2.19	0.73	
农房层数	1=1层；2=2层；3=大于等于2.5层且低于3.5层；4=大于等于3.5层	2.23	0.97	
居住年数	单位：年	17.16	17.65	
宅基地面积	单位：平方米	129.99	118.33	+
6. 宅基地自然禀赋				
山林、水源	0=不具有；1=具有	0.72	0.45	+
保护区、景区	0=不具有；1=具有	0.38	0.49	+
7. 宅基地社会禀赋				
距市距离	1=小于等于5km；2=5~10km（含）；3=10~20km（含）；4=20~30km（含）；5=大于30km	2.58	1.46	+
交通站点	0=不具有；1=具有	0.43	0.50	+/-
医院、学校	0=不具有；1=具有	0.47	0.50	+/-
超市、菜市场	0=不具有；1=具有	0.64	0.48	+/-
广场	0=不具有；1=具有	0.64	0.48	+/-
8. 政务服务				
咨询、服务满意度	1=很不满意；2=较不满意；3=基本满意；4=较满意；5=很满意	4.01	1.05	+

4. 自变量多重共线性检验

多重共线性指各解释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线性依存关系。已有研究表明，多重共线性不仅会影响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还可能会增大模型对参数估计的计量误差，导致分析结果不准确。因此，在 Logistic 回归分析中，我们需要对各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确保各自变量彼此相互独立。

本研究选取 21 个自变量对因变量进行模型回归，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影响模型估计结果，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对各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检验。一般认为，VIF 值越接近 1，则说明各自变量间多重共线性越弱；VIF 值大于等于 10 时，各自变量间则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检验结果显示：本研究选取的 21 个自变量，其方差膨胀因子（VIF 值）均接近 1，说明各自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即可以忽略因多重共线性影响模型估计结果的可能性。

四、农户宅基地是否流转下群体特征的类比分析

为了更全面的了解影响宅基地流转的各特征因素，辨析出未来可能进行宅基地流转的农户群体特征，有必要对各预测变量在宅基地流转与未流转两类样本中的分布情况进行详细的前后类比，探寻二者的差异。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关于农户的个人特征因素，数据显示：在年龄变量中，年龄在 40 岁以下对宅基地流转有抑制作用，超过 40 岁则有促进作用，且在 41~55 岁之间作用效果最强，流转样本比例比未流转高 8.83%，其原因可能是在此区间的农户经济水平相对富裕，子女也在 16~30 岁之间，大多在外读书或已成婚，无需家庭特地预留劳动力在家照顾，此时农户更有可能选择外出务工或寻找更好的生活居所，使得宅基地长期闲置，因此更可能对外流转获得额外收入；在性别变量中，流转样本的男性比例比未流转的男性比例高 18.74%，换言之男性相对于女性更愿意进行宅基地流转，其原因已在前文阐述，在此就不做过多探讨；在文化程度变量中，流转样本与未流转样本的文化水平分布无明显变化，这表明文化水平的高低对是否进行宅基地流转的决策行为影响较小，其可能原因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户因缺少很好的就业机会而更多的选择在家务农，而对于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户，受我国当下整体氛围的影响，他们对农村宅基地的重视程度提升，与以往相比更迫切的想拥有宅基地实实在在的使用权；在身份变量中，作为村委会或居委会干部更可能进行宅基地流转，比未流转的占比高出 8.65%，其原因可能是村干部相对有稳定的收入，且对宅基地流转政策理解的更加深入，为了响应政府的改革号召，他们对宅基地流转的热情更高。

表 2 宅基地是否流转下的变量特征类比 单位：%

项目	选项	未流转 样本比例	流转 样本比例
年龄	25 岁及以下	5.24	2.95
	26~40 岁	41.43	32.47
	41~55 岁	42.46	51.29
	55 岁以上	10.87	13.28
性别	男	50.26	69.00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9.34	8.12
	初中	31.84	31.00
	中专、高中	28.13	29.15
	大专	22.63	23.25
	本科及以上 ^③	8.06	8.49
身份	普通农民	72.12	63.47
	村或居委会干部	27.88	36.53
家庭	1~3 人	32.40	28.63

^③①文化程度在本科及以上的被调查者多为村或居委会干部、回乡创业者或在外地学习、工作但未外迁户口者。

人口	4 人	29.20	32.55
	5 人	19.33	21.18
	6 人及以上	19.07	17.65
家庭 务工 人数	0 人	40.61	39.84
	1 人	23.30	19.14
	2 人	24.23	28.13
	3 人及以上	11.85	12.89
家庭 年均 收入	5 万元以下	28.70	20.08
	5 万≤收入<10 万	42.72	44.79
	10 万≤收入<15 万	15.87	20.85
	15 万及以上	12.70	14.29
养老保险	购买	71.75	89.11
手艺	具有	19.55	33.85
宅基地面积	0~100m ²	48.30	41.67
	101~200m ²	39.94	47.62
	201~300m ²	7.65	6.75
	>300m ²	4.11	3.97

使用权证	颁发	59.34	76.75
层数	1 层	20.92	33.21
	2 层	42.34	37.74
	2.5≤层数<3.5	21.91	18.11
	≥3.5 层	14.83	10.94
建筑 结构	土坯、砖木	18.54	18.82
	砖混	42.07	47.60
	钢混	39.39	33.58
居住 年数	0~10 年	33.50	47.69
	11~20 年	27.17	25.00
	21~30 年	21.00	14.23
	>30 年	18.33	13.08
离市（县、区） 中心距离	0~10km（含）	52.30	41.70
	10km<距离≤20km	19.31	28.04
	20km<距离	13.30	18.08

	≤30km		
	>30km	15.09	12.18
山林/水源	具有	67.77	85.98
保护区/景区	具有	34.27	49.45
交通站点	具有	40.15	52.03
广场	具有	42.84	60.89
医院/学校	具有	60.87	74.17
菜市场/超市	具有	60.36	76.01

关于农户的家庭特征因素，数据显示：家庭人口变量在是否流转的两类样本中分布相似，而就业人口和家庭年均收入两个变量差异明显，家庭务工人数为 2 人及以上时，选择宅基地流转的比例比未流转的高出 4.94%，且家庭年均收入大于等于 5 万时，选择流转的比例超过未流转的比例，其原因可能是随着家庭务工人数增多，家庭的年均收入随之增大，经济实力的提升促使农户寻找更好的生活场所，因此导致农村宅基地闲置，更可能进行流转。

关于生活保障的影响因素，数据显示：当家庭成员购买养老保险或拥有手艺时，其更愿意进行宅基地流转。其中，购买养老保险且进行宅基地流转的样本比例比未流转的高 17.36%，拥有手艺且进行宅基地流转的比例比未流转的高 14.30%，比例差如此之大更说明农户的生活保障水平对是否进行宅基地流转的影响效应之大。

关于地权稳定性，数据显示：获得宅基地使用权证的农户进行宅基地流转的可能性更大，其流转比例比未流转的高出 17.41%，说明当农户得到宅基地使用权身份认证后，可降低对宅基地流转的预期风险，因此更可能进行闲置宅基地流转，从而获得更多收入。

关于宅基地和农房的状况，数据显示：宅基地面积在 101~200m² 时农户进行宅基地流转的可能性更大，而农房层数为 1 层且为砖混结构时，农户更愿意进行宅基地流转，其原因可能是农房为 1 层表明农户对宅基地的投资成本较少，其未来长久居住的可能性也会下降，因此更可能进行流转；对于宅基地居住年数变量而言，当居住年数在 10 年（含）以内时，农户进行宅基地流转的可能性增加，此时流转的农户比未流转的高出 14.19%，其可能原因是此年龄区间的农户目前年龄在 25~35 岁之间，这类农户多为青壮年劳动力，大多会选择外出务工获得更多的收入，因此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将常年闲置的宅基地对外流转获得额外收入。

关于宅基地的自然禀赋，数据显示：宅基地周边有山林（或水源）、保护区（或景区）的宅基地更可能进行流转，其中，有山林、水源的宅基地进行流转的样本比例比未流转的高出 18.21%，有保护区、景区的宅基地进行流转的比例比未流转的高出 15.18%，说明自然禀赋好的宅基地更有可能进行流转。

关于宅基地的社会禀赋，数据显示：只有当宅基地距市（县、区）中心距离为大于 10km 且小于等于 30km 时才可能促进宅基地的流转，当宅基地离市（县、区）中心很近时，农户更不愿意进行流转，原因可能是生活在该区位的农户可以便捷地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而与生活在城市相比，居住在农村的生活成本更小，因此更愿意将宅基地留作自用，而对于离市（县、区）中心距离过远的宅基地，若无其他禀赋条件的支撑，宅基地很难对外流转，而该类型的宅基地大多也会选择有偿退出模式进行解决；而对于交通站点、广场、医院（或学校）、菜市场（或超市）的相关变量，都可能对宅基地流转产生影响，其中，有交通站点、广场、医院或学校、菜市场或超市的宅基地进行流转的样本比例比未流转的分别高出 1 的 88%、18.05%、13.30%、15.65%，两者差异较大。

综上所述，在影响宅基地是否流转的各特征变量中，农户的年龄、性别和身份变量，家庭的务工人数和年均收入变量，反映未来生活保障水平的养老保险和手艺变量，反映地权稳定性的宅基地使用权证变量以及反映宅基地及农房状况和禀赋条件的相关变量在农户宅基地流转与未流转两类样本中都有一定的分布差异，这些差异也更直观地预测出未来可能进行宅基地流转的农户群体特征。

五、农户宅基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1.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选择 Logistic 模型对问卷数据进行估计。同时，由宅基地有无流转下群体特征的类比分析发现，宅基地离市（县、区）中心距离为大于 10km 且小于等于 30km 时进行宅基地流转的样本比例明显高于未流转样本比例，而当距离为小于等于 10km 或大于 30km 时，宅基地流转的样本比例则小于未流转样本比例，为了考察宅基地流转影响因素是否受其区位特征的影响，本文在数据分析中不仅对全部样本进行了回归分析，而且按照宅基地离市（县、区）中心距离划分为三个区间分别进行数据拟合，并运用 Stata15 软件运算出回归结果（见表 3）。

表 3 宅基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分析模型估计结果

类别	变量名称	总样本	离市（县、区）中心距离		
			≤10km	≥10km 且 ≤30km	>30km
1. 农户个人特征	年龄	1.440*** (0.192)	0.948 (0.210)	1.727*** (0.361)	3.706*** (1.575)
	性别	1.739*** (0.313)	1.993** (0.591)	1.694* (0.473)	1.389 (0.784)
	身份	1.266 (0.092)	2.212** (0.720)	0.990 (0.296)	0.465 (0.302)
	文化程度	1.043 (0.245)	0.792 (0.112)	1.230 (0.180)	1.717* (0.488)
2. 农户家庭特征	家庭人口	1.050 (0.084)	0.912 (0.118)	1.230 (0.155)	1.014 (0.245)
	年均收入	1.094 (0.087)	1.223 (0.167)	1.085 (0.135)	1.014 (0.231)
3. 生活保障水平	养老保险	2.304*** (0.559)	2.690** (1.072)	2.371** (0.896)	1.883 (1.351)
	手工艺	1.377* (0.262)	0.915 (0.311)	1.237 (0.354)	1.368 (0.879)

4. 地 权稳 定性	使用权证	1.561** (0.315)	2.149** (0.781)	1.253 (0.381)	0.941 (0.517)
5. 宅 基 地、 农房 特征	建筑结构	0.940 (0.122)	0.877 (0.189)	0.781 (0.160)	1.252 (0.476)
	农房层数	0.744*** (0.073)	0.680** (0.111)	0.979 (0.148)	0.525* (0.185)
	居住年数	0.980*** (0.006)	0.981* (0.010)	0.973*** (0.009)	0.990 (0.018)
	宅基地面积	0.999 (0.001)	1.000 (0.001)	1.000 (0.001)	0.996 (0.004)
6. 宅 基地 自 然禀 赋	山林、水源	1.322 (0.348)	2.366** (1.041)	0.961 (0.425)	0.645 (0.468)
	保护区、景 区	1.580** (0.295)	1.660* (0.507)	1.584 (0.461)	1.754 (1.098)
7. 宅 基地 社会 禀赋	距市距离	0.941 (0.057)	—	—	—
	交通站点	0.803 (0.160)	0.894 (0.293)	0.745 (0.229)	0.987 (0.636)
	广场	1.536** (0.313)	2.081** (0.685)	1.001 (0.319)	4.545** (3.115)
	医院、学校	0.768 (0.180)	0.860 (0.370)	0.938 (0.320)	0.455 (0.316)
	超市、菜市 场	1.384 (0.332)	1.126 (0.463)	2.166** (0.852)	0.479 (0.368)
8. 政 务服 务	咨询、服务	1.239** (0.108)	1.331** (0.192)	1.080 (0.145)	1.529 (0.422)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代表在 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由表 3 可见，于总样本而言，农户的年龄、性别、是否购买养老保险、是否具有手艺或颁发使用权证，宅基地的农房层数、居住年数，宅基地周边是否有保护区、广场以及对地方政府的咨询服务满意度 10 个变量都对因变量是否进行宅基地流转有显著影响。于分样本而言，当宅基地离市（县、区）中心距离为小于等于 10km 时，有性别、身份、养老保险、使用权证、农房层数、居住年数、山林水源、保护区或景区、广场以及咨询服务满意度 10 个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当宅基地离市（县、区）中心距离为大于 10km 且小于等于 30km 时，有年龄、性别、养老保险、居住年数以及宅基地周边是否有超市或菜市场 5 个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当宅基地离市（县、区）中心距离超过 30km 时，有年龄、文化程度、农房层数以及是否有广场 4 个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由此可见，距市（县、区）中心不同距离的宅基地其流转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且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的因素

会随着宅基地距市（县、区）中心距离的接近而变得更为复杂多样，其原因可能是相对于远郊农村而言，近郊农村的资源禀赋条件更加优越，有众多可推动农户闲置宅基地流转的动力机制，所以近郊农村的农户自主选择权更大，在选择是否进行宅基地流转时考虑的因素也会更加复杂。因此，在鼓励和开展闲置宅基地流转工作时，地方政府应针对宅基地所处的不同区位给予不同方面的影响因素关注，当然，回归结果的显著性水平也可能会受到样本量的影响。

考虑到分样本回归的样本量相对较小，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精确性，且相对于分样本而言，总样本中对农户宅基地是否流转的显著影响因素也更加全面。因此，接下来本文将对总样本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和总结：

（1）农户特征。根据计量结果显示，农户的年龄、性别对宅基地流转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年龄每上升一个阶段，进行宅基地流转的概率增加 44.0%；于性别而言，男性进行宅基地流转的概率是女性的 1.74 倍。由此可见，与农户特征的其他变量相比，农户的年龄、性别对是否进行宅基地流转的决策行为有显著影响。

（2）生活保障水平。根据计量结果显示，养老保险和手工艺两个变量对宅基地流转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购买养老保险对宅基地是否流转在 1%的水平上显著，购买养老保险且进行宅基地流转的可能性是未购买养老保险的 2.30 倍；对于农户是否具有手工艺变量，具有手工艺的农户进行宅基地流转的可能性是无手工艺农户的 1.38 倍。由此可以看出，农户对未来的可持续性生计问题十分注重，地方政府若想推动农村闲置宅基地流转的进程，首先应提升农户的社会保障水平。

（3）地权稳定性。根据计量结果显示，宅基地使用权证的颁发对宅基地流转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已获得该证书的农户进行宅基地流转的可能性是未获得的 1.56 倍。其原因可能是，确权强化了农户对宅基地的私有观念，且拓宽了宅基地及农房使用权的流转渠道，从而对宅基地流转有着有效的促进作用。

（4）宅基地及农房状况。根据计量结果显示，农房的层数和居住年数对宅基地流转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当农房层数每增加一单位，其流转的概率下降 25.6%；当居住年数每增加一个阶段，其流转的概率下降 2.0%。其可能原因已在上文变量定义与描述部分进行阐述，在此就不再重复。

（5）宅基地的禀赋条件。根据计量结果显示，于宅基地自然禀赋而言，宅基地周边有保护区或景区对宅基地流转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有保护区或景区的宅基地流转概率比没有的高出 58.0%。于宅基地社会禀赋而言，宅基地周边有广场对其流转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有广场的宅基地流转概率比没有的高出 53.6%；而对于宅基地周边是否有交通站点和医院（或学校）两个变量，虽然他们的回归结果不显著，但其系数都小于 1，说明这些变量对因变量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由此可见，不同的禀赋条件对宅基地流转的影响作用不尽相同。

（6）政务服务。根据计量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的咨询、服务水平对宅基地流转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政府服务满意度每增加一个档次，其流转的概率上升 23.9%。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大对宅基地流转工作的投入力度和工作热情。

2. 模型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设计的合理性，本研究选择修正后的皮尔逊卡方检验（即 HL 检验）对方程进行估算。其原理为：将模型的预测频数与实际观测频数相对比进行检验，零假设是模型预测频数与实际观测到的频数无显著差别，如果皮尔逊卡方检验的卡方值越小，检验结果则不显著，即表明预测频数与观测频数有很好的吻合度，模型拟合度较高。检验指标如表 4 所示，总样本以及距市（县、区）距离在小于等于 10km、大于 10km 且小于等于 30km 和 30km 以上的分样本模型估计的 HL 检验结果都不显著，说明模型预测的概率值与实际观测值无显著差异，该模型对概率预测的效果良好。

此外，本文还对模型整体做了类似拟合度检验（Count R^2 ）。其原理为：假设将每一个观测单位预测一个概率，若该预测概

率大于 0.5, 该观测单位便会采取行动, 而若该预测概率小于等于 0.5, 则不会采取行动, 将这一预测的行为结果与实际发生的行
为结果进行对比, Count R^2 就是将那些预测正确的样本数除以样本总数的一个比例值。检验结果显示, 模型的 Count R^2 值都大
于 0.70, 即表明模型能够预测 70%以上的因变量行为, 模型的整体设计良好。

表 4 模型检验

检验指标 样本类型		皮尔逊卡方检验的修 正 (HL 检验)	类拟合优度 (Count R^2)
总样本		Prob>chi2=0.3129	0.729
离市 (县、 区) 中心 距离	≤10km	Prob>chi2=0.4378	0.749
	10km<距 离≤30km	Prob>chi2=0.2160	0.705
	>30km	Prob>chi2=0.1365	0.820

六、结论与讨论

1. 研究结论

闲置宅基地流转是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时代选择, 本研究聚焦于农户的宅基地流转行为, 基于农户行为理论构建影响因素
指标, 以“江苏、浙江、安徽、江西”4 省的 1053 份调查数据为研究基础, 利用类比分析法和有序 Logistic 模型分析了宅基地
流转的主体特征和影响因素, 且依据类比分析得出的结论按宅基地距市(县、区)中心距离将其划分为三类农村宅基地, 比较分
析各类农村宅基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差异。研究表明: 农户在进行宅基地流转决策时更符合农户行为理论中的历史学派观点, 即农
户会受内外部环境等其他不确定性因素的干预而做出有限理性决策, 各种内外部环境的差异都可能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决策行
为。在农户决策过程中, 农户会基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以及宅基地与农房状况等因素而做出理性人决策,
往往该决策行为并非是完全理性下的行为选择, 而是基于农户当期认知水平下的“最优”选择。此外, 在宅基地流转的具体实施
过程中, 除了农户的流转决策意愿外, 宅基地禀赋条件及区域内宅基地流转政策的实施效能也同样会影响宅基地流转的最终结
果。

(1) 在主体特征分析中, 农户的年龄、性别、身份变量, 家庭的务工人数、年均收入变量, 反映生活保障水平的养老保险
和是否具有手艺变量, 反映地权稳定性的使用权证变量以及反映宅基地及农房状况和禀赋条件的相关变量在农户宅基地流转与
未流转两类样本中都有明显的分布差异, 而这些分布差异也恰恰反映出流转与未流转两类农户的特征差异, 为未来更精确地定
位可能进行宅基地流转的农户群体提供方向性参考。

(2) 在影响因素分析中, 农户的宅基地流转决策行为主要受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双重影响。其中, 农户的年龄、性别、是
否购买养老保险、是否具有手艺或使用权证, 宅基地周边是否有保护区、广场以及对地方政府的咨询服务满意度相关变量都对农
户进行宅基地流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宅基地的农房层数、居住年数对农户进行宅基地流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最终把宅基地
是否能够成功流转归结为正、负因素博弈下的结果。

此外,在三类农村地区的对比分析中,其具体的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总体呈现为:宅基地流转的影响因素会随着宅基地距市(县、区)中心距离的远近不同而存在差异,即与远郊农村相比,近郊农村的农户在进行宅基地流转时考虑的因素更为复杂。因此,在未来的宅基地流转工作中,地方政府应根据宅基地所处的区位、禀赋条件以及农户的个体特征给予不同的工作重心关注。

2. 研究探讨

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决策行为的因素错综复杂,且各因素对不同决策群体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政务服务方面,应注重流转前、中、后全过程的参与和保障。在流转前,地方政府应该为宅基地流转工作做好充足的准备,比如加大对宅基地流转政策的宣传力度、为农户提供多维的咨询服务平台、根据农村的禀赋条件建立适宜的宅基地流转管理模式等;在流转中,应建立规范的流转程序,注重维护良好的流转交易秩序,在推进宅基地流转市场化的同时确保流转交易行为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在流转后,更应注意到宅基地流转后农户生活方式发生的变化带来家庭归属感等心理的偏差以及农户后期生活保障性的问题,地方政府应依据当地农村的禀赋条件,培育适合自身发展的农村新业态,并完善对流转农户的持续保障机制,提高农户的可持续生计水平。

(2) 政群关系方面,应尽快建立互联互通的信息共享机制。一方面,完善的政群信息共享机制可以增进农户对政府工作的信任感,有效减少政策实施阻力,并且也有助于政府在与农户的信息共享中及时准确地获知农户的需求,高效精准地进行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从政策实践的角度来看,完善的信息服务与共享有助于降低政策实施的交易成本,这是促进农村闲置宅基地流转的一大关键要素,地方政府应努力加强与当地农户的交流合作,共同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形成政府与农户之间合作共赢的和谐之风。

(3) 平台构建方面,应推进多功能服务平台的优化升级。加快构建信息公布、流转签证、招商投资等于一体的农村土地市场交易平台,通过市场机制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增加农户财产性收入。农村土地交易平台聚集了众多的参与主体,一方面,可通过平台进行及时的信息公布与信息共享,并通过对平台大数据的积累和运用,辨析出目标群体的特征与行为偏好,实现精准流转,提升宅基地流转的服务水平;另一方面,可借助平台加大对社会优质资本的引入,并通过加强对各主体的监督和管理,规范宅基地流转的市场秩序,提升投资者的投资体验,营造一个健康的宅基地流转运行环境。

(4) 农户自身方面,应通过合理的定位与预期进行宅基地流转决策。从以往研究来看,农户宅基地流转行为易受外界环境的干预而出现典型的“羊群效应”作为一个理性的农户,在宅基地流转决策过程中既要参考他人的流转经验,也要依据自身的家庭条件、宅基地禀赋条件以及对未来生活的理想化预期进行合理的决策定位,实现流转双方的效益最大化。

本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与特色在于:与已有研究不同,考虑到农户宅基地是否能够成功流转与农户的流转意愿二者存在差异,本研究首次以农户家庭宅基地是否流转为被解释变量,以农户行为理论为理论基础构建研究框架,分析农户宅基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并对农户宅基地流转的群体特征进行专项分析,探讨农户宅基地有无流转下两类主体的群体特征差异。这些研究对拓宽宅基地流转因素分析的研究视角以及在未来宅基地流转的实际操作中都具有十分有价值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此外,本文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拓展。一方面,可以从地方经济水平的角度对农户进行划分,做更深一步的分析,探究地方经济水平的差异对农户宅基地流转决策行为的影响差异,本研究虽然采用了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数据进行分析,但是没有对各地区具体的经济水平进行样本划分做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此方向做进一步探索;另一方面,可以探究宅基地所处的人文地理特征差异会对当地农户宅基地流转决策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效应,本研究发现宅基地的自然禀赋和社会禀赋差异对农户宅基地流转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未针对性的以宅基地的人文地理特征为

划分标准做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未来的研究也可以在此方向上借助 PSM、DID 等计量方法做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 [1]宋伟, 陈百明, 张英. 中国村庄宅基地空心化评价及其影响因素[J]. 地理研究, 2013, (01).
- [2]李丽, 吕晓, 张全景. “三权分置”背景下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学视角再审视[J]. 中国土地科学, 2020, (03).
- [3]黄建伟, 董冠宇, 张兆亮. 闲置宅基地流转的协同治理能提高基层政府权能满意度吗? ——基于南京高淳区的实证研究[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1, (01).
- [4]董新辉.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困境、出路与重塑[J]. 学术交流, 2018, (09).
- [5]唐军, 郑泰安. 宅基地使用权: 法理解构、价值取向与制度优化[J]. 农村经济, 2021, (06).
- [6]钱龙, 陈会广, 陈方丽. 确权促进了宅基地流转吗? ——基于温州农户的调查[J]. 经济体制改革, 2020, (02).
- [7]李荣耀, 叶兴庆. 退出与流转: 农民宅基地处置选择及影响因素[J]. 农村经济, 2019, (04).
- [8]吴郁玲, 石汇等. 农村异质性资源禀赋、宅基地使用权确权与农户宅基地流转: 理论与来自湖北省的经验[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 (05).
- [9]张梦琳. 农村宅基地流转前后农户福利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四市为例[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02).
- [10]关江华, 黄朝禧, 胡银根. 不同生计资产配置农户宅基地流转家庭福利变化研究[J]. 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 2014, (10).
- [11]马志雄, 丁士军. 基于农户理论的农户类型划分方法及其应用[J]. 中国农村经济, 2013, (04).
- [12]张华新. 个体决策行为的经济和心理学分析——201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研究成果述评[J]. 上海经济研究, 2017, (12).
- [13]邹秀清, 李致远, 谢美辉. 农民产权认知冲突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J]. 江西社会科学, 2021, (02).
- [14]陈美球, 亦佛缘, 鲁燕飞. 生计资本分化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省的实证分析[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18, (01).
- [15]胡银根, 吴欣等. 农户宅基地有偿退出与有偿使用决策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传统农区宜城市的实证[J]. 中国土地科学, 2018, (11).
- [16]公茂刚, 王如梦, 黄肖. “三权分置”下农村宅基地流转演化博弈分析[J]. 重庆社会科学, 2021, (03).
- [17]于伟, 刘本城, 宋金平. 城镇化进程中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决策行为及影响因素[J]. 地理研究, 2016, (03).

[18]刘蕾. 农户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参与意愿研究——基于定州市农户的调查[J]. 社会科学家, 2019, (07).

[19]马述忠, 梁绮慧, 张洪胜. 消费者跨境物流信息偏好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1372 家跨境电商企业出口运单数据的统计分析[J]. 管理世界, 2020, (06).

[20]杨卫忠. 农村城镇化背景下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中农户羊群行为与后续效应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19, (05).